

中国现代 学生运动史长编

上

于学仁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 学生运动史长编

上

●于学仁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 学生运动史长编

下

●于学仁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

Zhongguo Xian dai Xuesheng Yundongshi Changbian

于学仁

责任编辑 侯文富 封面设计 李冰彬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10号) 长春建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1988年6月第1版
印张: 25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530 000 印数: 1—2 000册

ISBN 7-5602-1857-K·22 定价(上下册): 4.30元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学 生群	(1)
一 近代中国学生群的出现.....	(1)
二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运动.....	(11)
第二章 新世纪初青年学生的思想启蒙与 思想解放.....	(24)
一 在黑暗中采集火种.....	(24)
二 新旧思潮的激战与思想启蒙运动.....	(32)
三 沉默中待发的学生爱国运动.....	(46)
第三章 “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学生 运动的第一次高涨	(55)
一 “五·四”爱国运动.....	(55)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	(78)
第四章 旅欧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25)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学生运动的恢复发展.....	(151)
一 学生运动确定正确方向.....	(151)

— 1 —

二 学生运动的恢复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164)
三 统一战线建立前后的学生运动	(190)
第六章 大革命前后的学生运动 (207)		
一 “五卅”反帝风暴中的学生运动	(207)
二 北方学生“三·一八”反帝示威运动	(221)
三 大革命洪流中学生在政治上的分化	(234)
四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学生运动低潮	(251)
第七章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救亡 运动的兴起 (278)		
第八章 “一二·九”运动——中国现代学生 运动的第二次高涨 (312)		
一 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复兴	(312)
二 “一二·九”运动	(322)
三 中国共产党关于学生运动指导方针的转变	(404)
四 青年学生迎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	(427)
第九章 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学生运动 (473)		
一 青年学生的抗战救亡热潮	(473)
二 “到敌后去！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	(487)
三 全国进步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506)
四 学生运动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	(522)
五 解放区学生一面战斗、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533)
六 解放区学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下的思想革命	(545)
七 国民党顽固派对青年学生的高压政策	(550)

八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 指导方针	(560)
九 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勃发	(569)

第十章 抗战胜利初期国统区学生争取和平与 民主的斗争	(589)
一 “一二·一”昆明学生运动	(589)
二 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反内战怒潮	(605)

第十一章 “第二条战线”中的学生运动	(615)
一 声势浩大的反美抗暴运动	(615)
二 “五·二〇”运动——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三次高涨	(644)

第十二章 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691)
一 国统区学生沿着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方向前进	(691)
二 争取和教育东北青年学生	(714)
三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工作方针和 斗争策略	(718)
四 国民党统治区学生为迎接新中国的曙光而战斗	(730)
五 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	(744)
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	(760)
七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代	(771)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学生群

一 近代中国学生群的出现

近代中国的学生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是伴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步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出现的。毛泽东说过：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并刺激了中国社会的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即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广大农民破产，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贫民群众。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还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大小知识分子，^①即中国近代社会的学生群。

一八四〇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第一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它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下同），第1373—1374页。

侵略与武装侵略同步进行。西方传教士往往尾随于侵略军之后，在华建立洋学堂“帮助中国归化”。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直言不讳地说，“我等在中国传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①英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之后，就把一八三九年创办的一所小学“马礼逊学堂”从澳门迁到香港，由美国基督教徒布朗担任校长，第一批学生有容闳等六人，开设的课程有中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和英文等，也曾开设过化学课。一八四二年，英国布道会决定把它在东方的传教中心机关从马六甲迁至香港，并将一八一八年创办的英华书院也迁到香港。一八四四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除讲授圣经外，还有国文、算术等，并学习缝纫、刺绣。这是外国在华创办最早的教会女校。

一八四五年，英国当局又强迫清政府公布了《上海租地章程》，获得了土地“永租权”，在上海首先设立了“租界”。租界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开始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这时开始，外国人在上海开办了很多洋学堂，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开设的裨文女塾，收走读学生二十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于徐家汇创设徐汇圣依纳爵公学，初收学生十余人；美国圣公会教士琼司女士在虹口开设文纪女塾，初收学生八人，后稍有增加。另外，外国传教士在福州等地也开办了一些学校。这些早期的教会学校，一般的是以小学为主，学生数也很少，这是我国近代学生群的最早来源。

^① 《新华时事丛刊·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1页。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腐败的清王朝，反动的统治阶级认识到，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学习西方的“长技”。于是开始了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地方实权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以“图强”、“求富”为名，先是借洋兵助剿，聘请洋教官，购买洋枪炮，继而发展为自建军火工业，七十年代以后，又开始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和铁路。为了“师夷长技”，洋务派在坚持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同时，注重教育以培养洋务人才，“求制造之根本”。一八六一年，清政府迫于形势，采纳了洋务派中央实权人物奕诉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诉为了改变因与西方语言不通而“一切隔膜”的状况，于一八六二年在总理衙门下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学校。后来奕诉又排除了顽固派的非难，先后设立了对传播自然科学知识起了积极作用的天文算学馆、观象台、格致馆等。这样，同文馆就从单纯培养翻译人才的机构，逐渐成为有科学内容的新学堂。这些学堂与教会学校开了新风气之先。继同文馆之后，李鸿章先后在上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一八六三年，后改称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一八六四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一八六五年）、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一八六六年）、天津机器制造局所办的水雷、水师、电报各学堂（一八八二年）、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一八八六年）、台湾西学堂（一八八七年）、广东水陆师学堂（一八八七年）。这些新学堂的大量创办，既改变了传统的教学内容，也改变了取仕的标准和方法，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因此，洋务派所办的洋学堂，成为中国近代学生群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充分暴露了洋务派的腐败无能及其反动本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标志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救亡图存”的口号，发动了以变法为主要目的的维新运动。改良派主张废除腐朽的科举制度，多次建议清政府应令“各省州县遍设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声、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他们强调，这些“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①一八九六年八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很多政论文章，在教育方面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②谭嗣同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湖南分会，筹办算学格致馆，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开创湖南文化教育的新风气，不久，南学会、时务学堂、算艺学堂、算学馆先后建立。一时，全国各地兴起了办学热潮，如大理寺卿盛宣怀在天津设立中西学堂（一八九五年，后改为北洋大学堂）、在上海督办南洋公学（一八九六年）。这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一八九八年七月，光绪皇帝正式准设“京师大学堂”，规定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是我国近代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校。这个期间，影响较大的学堂有：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一八九七年）；张元济、严复创办的北京通艺学堂

^①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② 同上第72页。

(一八九七年)、湖北的自强学堂、直隶的中等学堂、天津的北洋高等学堂、江苏的南京江南学堂、江西的南昌算学堂、贵州学堂、浙江的崇实学堂和中西学堂、广东的时敏学堂、四川和奉天的中西学堂、山西的储材馆等。一八九八年九月，由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血腥屠杀维新派人士，“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证明了在中国通过改良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但维新派的一些主张和措施，却是震撼人心的。著名的改良主义实业家张謇，从状元到实业家，走出了一条封建士大夫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他弃官回乡致力于兴办民族工业，以图“实业救国”。他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而“师范为教育之母”，并在南通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张謇还积极倡导职业教育，开办了纺织学校、医校、农校和商校等。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联合镇压了义和团农民起义，加紧了瓜分中国的侵略活动，美国当局以“退还”庚子赔款为名，在太原开办山西大学堂，以后又在北京创办清华学堂，还有成都的华西大学等。这些学校都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前夜。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正是为了使中国“难以再生”义和团那样的事件^①，以“最圆满和巧妙的方法”和“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去“教育这一代年青中国人”，“控制中国的发展”^②。正是由于

① 斯密士：《今日的美国与中国》，1907年纽约版，第230页。

② 詹姆士：1906年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转引自1950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载文《美帝退还庚款的阴谋》。

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新学堂的增加是相当迅速的，学生的数目也在不断地增长。据统计，一九一二年八月至一九一三年七月，学校和学生的数字情况^①如下表：

类 别	所	人
全国公立、私立大	4	481
专 科 学 校	111	35 633
公 立、私 立 中	500	59 971
师 范 学 校	253	28 605
职 业 学 校	79	14 469
小 学 校 (包括幼稚园)	86 318	2 793 475

据上表，中等以上的学 生 已达十四万三千一百五十九人，他们已经构成既区别于封建士大夫，也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中国近代学生群。它是在中国逐步殖民地化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再则，他们既然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就必然担负着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在中国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中国近代的学生群一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就是爱国的。因为，中国学生群形成的历史过程，正表明我们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凌辱和危难的不断加深。在外国侵略

^①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的威胁下，争取民族独立，把祖国从外国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这是中国由落后变为先进工业国的首要条件，也是中国人民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学生群既然产生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们中间绝大多数必然是爱国的。当时的清政府用种种手段来拢络和控制学生，帝国主义者也企图利用中国学生学习西方的热情，使中国学生成为洋奴才。但是，他们的欺骗和诱惑，逐渐为他们的侵略活动所戳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全国很多地方的学生起来，举行了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运动。到二十世纪初，抗俄、反日、抵制美货的爱国斗争，连续不断。在这斗争中，涌现出无数为国为民，立志振兴中华的先进人物。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便是较早一批学生中的杰出代表。他以崇高的爱国思想，留学美国毕业后即返回祖国，英勇地参加了反击法国侵略者的马尾海战，并以一心为国争光的决心，亲自主持京张（家口）铁路的修筑，使之提前两年，而于一九〇九年八月胜利完工。维新改良时期的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出于“图强保种”的爱国愿望，介绍和宣传了当时西方科学最有影响的进化论。一八九八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用“物竞”、“天择”概括达尔文学说的基本精神，并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提到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规律的高度，指出它“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强国利民”。他认为，世界都在不断地进步，中国如不奋发图强，除旧布新，则将无以自存于世界。严复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不啻是一声大吼，震动了整个思想界。他向全国人民敲起了危机与图救的警钟。他的爱国思想影响了我国一代青年，激

励他们奋发图强，自强、自立、自主、自存。进化论成为风行一时的词汇。严复成为“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①。他敏锐地看到了当时中国落后的症结，主要不是缺少声光化电和船坚炮利，而是缺少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民族精神的觉醒。因此，他着重介绍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和科学方法。严复推崇达尔文，但却不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说明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生物科学的停滞，而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国家的兴亡存败。他告诉青年学生，学习西方主要是为了救亡图存和变革维新，而不是为了单纯增长知识。严复鼓吹进化论，正是按住了这个时代前进的脉搏，并指出阻碍社会进步的就是那些封建顽固的守旧势力，他们即使译洋书、学洋法，也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这是给封建顽固的守旧势力以致命的一击，促进了人们的觉醒。此外，他还把穆勒的《名学》，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介绍过来，广为传播，使“新学”有了比较明确的理论形式和全面的思想内容。如果说，从旧士大夫魏源的“师夷长技”到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理论还没有摆脱传统“经学”束缚的话，那么，严复作为早期学生的优秀代表，他的译著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提供了建立在广阔的领域上，打开了青年一代的眼界，使不少的青年学生从闭塞混浊的黑暗王国里走出来，走现实向生活，参加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密切联系的实际斗争。从此，思想的批判变成了社会的批判。

第二，中国近代学生群，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桥梁。甲片战争以后，我国长期闭关自守的

①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第375页。

局面被打破了。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远远地被落在后边。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奴役，这正是我国逐步殖民地化的重要原因。近代史上一些忧国忧民的先进分子，认为要抵抗外国列强的侵略，只有做到富国强兵；唯一的办法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资本主义化。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所兴办的洋务运动，并不是要否定封建制度和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他们的“图强”并不是为了与外国侵略者相对抗，而只是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从此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潮流，中国学生群正是适应了这个潮流而产生的。西方的科学技术经过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个桥梁大量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当然，必须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想实现资本主义化，是不可能的。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后，并不是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与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使中国资本主义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

第三，中国近代学生群，是作为封建教育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革命的文化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官僚集团开办了军事工业、煤铁工业和其他工业，他们不再把西方科学技术看作是“奇技淫巧”，而多少承认是有用之学。左宗棠就曾谈到：“中国人才本胜外国，维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①

^① 引自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5册第459—460页。

虽然，他无意于否定封建的教育制度，但从他的话中可以觉察到，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不能造就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反而成为造就人才的障碍。因此，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这一社会的实际需要，必然向封建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提出挑战。废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是近代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反映了时代的基本要求。

近代中国处于社会的大变动之中。洋务派意识到这一点，李鸿章承认外国入侵使中国面临三千多年来未有的“大变局”。顽固派死守旧规而惧怕和拒绝一切的变；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仍然使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维持不变。在洋务运动中从买办商人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郑观应，则提出区别于洋务派的一种主张，即“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①，从而否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的主张。因为洋务派的“中学为体”，无非是坚持两条：一是坚持三纲五常、孔孟之道的封建思想体系，二是坚持封建君主专政。郑观应的主张，是把设学堂、授西学与废科举结合起来，同时变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共和。因此，郑观应所提出的“西学”，不仅仅是西方的“长技”，而且是包括了西方资产阶级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郑观应的思想，在当时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少年时就“非常喜欢”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并萌发了“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②。这种愿望，终于汇合成要求变革现行制度的强大的历史潮流，迫使清政府于一九〇三年

① 《盛世危言》彭序，《戊戌变法》（丛刊），第39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页。